



## 当恐惧变成了爱 ◦ 对中国政治信任的部分解释

### ● 理论：Fear Love.

在中国，各种调查所发现的超乎寻常的政治信任度引发了持续的怀疑 ◦ 研究中国的政治文化学者们竭力将 "恐惧因素" 与调查结果分开 ◦ 当成功做到这一点时，一些人认为恐惧是夸大中国政治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的作用很小，甚至微不足道 ◦ 虽然结论不同，但 对立 的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如果答案是出于恐惧，那就是 "假的"，如果检测到诚意，就不可能是出于恐惧 ◦ 这个假设忽略了一个现实，即人们可以真诚地爱他们所害怕的东西 ◦ 事实上，恐惧有时甚至可以成为这种爱的动力 ◦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高压力和高赌注诱使人们服从/参与的时候，人们常常用真正的信念来合理化他们的服从/参与 ◦ 正如许多回忆录所揭示的那样，在毛泽东时代，大多数中国人真心爱他，他们也真心惧怕他 ◦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人民也可以这么说 ◦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朝鲜人民也是如此 ◦

诱导性顺从可以导致真诚的信仰，这个想法当然不是本研究的发现 ◦ 它来自于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长期传统。"认知失调" 理论 ◦ 费斯廷格首先阐述了它..... 待解释。◦ 之后的许多研究证实了..... 待解释。◦ 然而，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的调查数据来研究这一理论还是第一次，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分析各种调查数据所发现的持续的高政治信任度 ◦

应该强调的是，在认知失调的文献中，适应性行为并不总是导致价值的改变 ◦ 它需要在压力下的行为符合某些条件才能产生价值改变。

本研究认为，在当代中国存在这样的条件。

### ● 自变量：恐惧因素

虽然政治恐惧在民意调查中是出了名的难以衡量，但本研究建议使用两个因素的组合 ◦ 1) 受访者的生计/声誉/事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我们称之为 "杠杆" 因素；以及2) 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要求专一的政治忠诚，我们称之为 "压力" 因素 ◦ 我们认为，这两个因素都是诱发恐惧的关键，而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短缺都会大大减少政治恐惧 ◦ 高杠杆率意味着国家有能力 "劫持" 一个人的未来 ◦ 然而，如果国家不严格要求绝对的忠诚，一个政治上 "挑剔" 的人就不必担心这种潜在能力会变成现实 ◦ 例如，在日本，公立学校的教师依靠国家维持生计，但并不要求他们对执政党完全忠诚，因此政治恐惧不太可能在他们中间流行 ◦ 另一方面，当国家对政治忠诚度有很高的要求，但对某些人却没有什么影响力，例如，工厂恰好位于外国土地上的私人商人，这些人也不会轻易陷入政治恐惧 ◦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极端的政治恐惧，从而在我们看来，个人崇拜的狂热程度，往往会发生在大多数资源被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中 ◦

因此，我们构建了一个 "恐惧因子"，一个结合了国家依赖程度和国家压力程度的变量，以衡量政治恐惧。具体来说，我们用职业来衡量国家的依赖程度。"政权内部人"（体制内人）对国家的依赖程度要比 "体制内人" 高得多。"我们所说的 '体制内人' 是指政府官僚、党政官员、国有企业员工、国家控制的 '群众组织' 办事员等，总之是指那些不仅在经济上依赖国家，而且在职业晋升和社会地位上依赖国家的人。因此，与 '政权外人' 相比，他们有更多理由在政治上感到恐惧。"事实上，可以说，他们在 '政权内部' 呆得越久、越深、越高，他们就越害怕，因为如果被体制抛弃，他们的 "沉没成本" 会更高。

从2002年到2019年的五波亚洲晴雨表调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操作杠杆因素的机会。除了一系列的政治信任指标，它还不包含了受访者的职业信息，使我们有可能区分出 "政权内部人" 和 "政权外部人"。"它还包含受访者的年龄，我们用它来代表政权内部人员对国家的依赖程度，因为一个人的年龄越大，他/她就越不可能离开 '体制'，他/她就越有可能得到晋升，并从体制中获得更高的收入。（年龄因素可以不考虑，除非它加强了我们的结果。我对于年龄因素的效果没有明确的预感，因为中国的确有可能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 "自由化"，但是现代化又有自由化的作用，所以可能相互抵消）。

同时，我们用政治威胁的可信度来衡量 "压力因素"。在江-胡时代，政权内部人员基本可以在没有自上而下压力的情况下实现利益最大化，但在习近平时代，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开始了，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政权内部人员受到惩戒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将习近平的年份编码为1，而将胡锦涛的年份编码为0。（甚至可以考虑区分浪潮4和5，5的值比4高，因为W4的时候反腐程度有限，而且很多人可能以为是一阵风，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大家知道不是一阵风，而且被卷入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同样。这样做与否取决于系数的变化）。

所以，"恐惧的晴雨表" 的组成，具体而言：。

Leverage: 工作体制内与否 (Yes1, No0)；（也许纳入年龄因素来衡量深入体制程度，但这取决于它是否能加强我们的结果。）

压力：胡或习 (Xi1, Hu0)。C（也许可以区分w4和w5来测量压力强度，但还是要看它对结果的影响）。

恐惧=杠杆\*压力，

从我们的结构公式中可以看出，我们将截面成分（是否内部人和年龄）与纵向成分（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结合起来，将它们的相互作用作为我们对政治恐惧的测量。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有益的，不仅是因为我们前面提出的概念上的需要，而且它还有助于捕捉更多的恐惧变化。

## ● 因变量：政治信任

这个应该很简单，待写。如果政治信任效果不佳，也可以考虑之前我们用的对中国民主的满意度，。

目标：证明杠杆因素本身是弱的，而压力因素本身是弱的。

但二者交互性很强。因此，建立恐惧对政治信任有因果效应。

● 潜在的反驳和回应策略。

- 1) 恰恰是因为 "爱党爱国"才进入体制内。反驳：22-29岁的 "体制内人" ("刚刚进入体制) 并不比同龄人的非体制人更忠诚 (描述性数据甚至显示更不忠诚)，也就是说，在体制的 '入口处'，他们并不更加忠诚，后面的差异不能用 '起点处的信念不同'来解释。
- 2) 性能 (他们收入更高，生活状况更好。)：可以用家庭经济状况来衡量。事实上，一般是收入越高的人越 '反动'。
- 3) 伪造，他们只是有更大的压力假装信任而已，反驳：除了我们之前用过的史天健方法 (DK答案) 和李连江方法 (hierarchical trust)，我觉得还可以有一个方法 (我好像也看到有人用)：比较敏感和不敏感问题的变化轨迹--在不敏感问题上 (但同样是测试政治信任)，回答者没有必要撒谎，如果仍然政治信任上升与恐惧，说明这个上升是真实的。比如，测试对 '地方政府的信任'--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撒谎。我大致看了一下，变化轨迹和对 '中央政府的信任'是一致的。
- 4) 还有什么反驳？。。。。，反正就说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法不对 (毕竟我们刚写了一篇论证宣传作用，呵呵)，而是他们不够强大，无法驳回我们的论证。